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美] 戴维·斯沃茨 著
陶东风 译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美] 戴维·斯沃茨 著 陶东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美]斯沃茨(Swartz, D.)著;

陶东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5

(当代学术思潮)

书名原文: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ISBN 7—5327—3836—1

I. 文... II. ①斯... ②陶... III. 布尔迪厄, P. (1930—2002)—社会学—理论

IV. ①B565. 59 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3064号

图字: 09—2002—495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利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责任编辑 方红玫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美]戴维·斯沃茨 著

陶东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mm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09 000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836—1/B·226

定 价 38.00元

鸣 谢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研究行为——阅读、反思一个从理论上加以建构、从经验中得到激发、最终指向政治的社会学的丰富而复杂的体系——的产物。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得益于一些朋友与同事的帮助与支持，我愿意在此表示感谢。

在法国，让·巴赞首先把布尔迪厄(Bourdieu)的著作介绍给我，而且提供了关于法国知识界的有价值的见解。菲利普·贝斯纳德、穆罕默德·沙尔卡维、莫德·埃斯佩罗、莫尼奎·德圣马丁以及米歇尔·皮亚卢，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多种场合帮助与鼓励我。我还要感谢布尔迪厄，当我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做学生期间，他对于社会学方法的严肃认真的关注把我从知识的浅尝辄止的诱惑中解救出来。他的社会学激发了我以后的教学与研究，他还友善地约我讨论他的著作的各个方面。无疑，布尔迪厄希望看到我的论述不是对他的亦步亦趋，或者与他的完全不同。我努力成为他的著作的一个有理解力的读者，而不是(布尔迪厄的)一个信徒。希望这本书既能阐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想象的丰富复杂性，又能引起人们对这种丰富的复杂性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在美国，我要特别感谢杰里·卡拉贝尔，他在巴黎“招募”我，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的工作。他把我介绍给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学家群体，这些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分层的社会学家，在当时被称为“休伦学会”(Huron Institute)^[1]的地方组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研究群体。史蒂

[1] 休伦是北美的一个湖的名字。——译者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夫·布林特、保罗·迪马吉奥、凯文·多尔蒂、大卫·卡伦、凯瑟琳·麦克莱兰、迈克·乌斯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我的这次知识之旅中提供了有益的忠告与支持。 特别感谢彼得·基尔比与鲍勃·伍德，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伸出了团结之手。 薇拉·佐尔贝克则帮助我熟悉法国学术界。

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道格·米切尔对于本书的自始至终的友好支持，感谢克劳迪娅·雷克斯对于本书手稿的精心编辑，感谢美国学会理事会提供的基金，使我在法国的学术之旅成为可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家人对于这项工作的自始至终的支持，并把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丽莎以及我的两个孩子埃琳娜与丹尼尔。

目录

鸣谢/1

第一章 布尔迪厄导论/1

第二章 职业生涯与思想影响/17

第三章 布尔迪厄社会学知识的原理论/61

第四章 布尔迪厄的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76

第五章 习性：关于行为的文化理论/110

第六章 权力斗争的场域/136

第七章 社会阶级与权力斗争/163

第八章 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218

第九章 知识分子与知识场域/248

第十章 科学知识分子与政治/279

第十一章 为客观性而斗争：布尔迪厄对反思社会学的呼唤/304

第十二章 结论/320

参考文献/332

译后记/353

第一章

布尔迪厄导论

文化为人类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它同时也是统治的一个根源。艺术、科学以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本身——不仅塑造着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构成人类交往的基础，而且帮助确立并维持社会等级。文化包括信仰、传统、价值以及语言；它通过把个体和群体联系于机构化的等级而调节着各种各样的实践。无论是通过倾向(disposition)、客体、系统的形式，还是通过机构的形式，文化都体现着权力关系。而且，许多发达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建构了相对自主的、为了区分而进行斗争的舞台。知识分子——专业化的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在建构这些舞台及其机构化的等级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这就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这位今天法国引领潮流的社会科学家力图说明的观点。

随着布尔迪厄在1981年当选为地位显赫的法兰西学院社会学主席，他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一样，成了战后法国最受尊敬的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多产的、创造力超常的研究者，在1958—1995年间，布尔迪厄已经出版了30多本书，发表了340多篇文章。其中许多是合作的，因为布尔迪厄是他自己的研究中心——欧洲社会学中心——的创建者与主任，^[1]他同时主编自己的社会学杂志《社会科学研究会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1] 进入法兰西学院以后，布尔迪厄把他的大部分工作转向了教学，而把中心的管理工作交给他以前的合作者，包括莫尼奎·德·圣马丁以及让-克洛德·孔贝西。

Sociales)，并与子夜出版社一起主编自己多达 60 多本的文选 [《常识》*Le sens commun*] 一书正在印制中]。^[1] 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尔迪厄的努力已经在发展真正的法国社会学新学派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足以与 20 世纪早期的涂尔干(Emil Durkheim)——布尔迪厄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相媲美。

由于近来出版了大量布尔迪厄著作的英译本，使得人们对于布尔迪厄的了解越来越多。受此推动，在英国与美国，人们对布尔迪厄的兴趣也急剧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美国，布尔迪厄已经成为引用率最高的法国社会学家之一，超过了列维-斯特劳斯。^[2] 在社会学家中，布尔迪厄是因为他早期与帕斯隆(Jean-Claude-Passeron)合作的关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特别是他们被引用最多的著作《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1977)而被最广泛地了解的。^[3] 但是，布尔迪厄还因为其对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研究而著称(特别是在人类学家中)，这方面的研究见于他的《阿尔及利亚人》(*The Algerians* 1962a)*、《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1977c)、《实践的逻辑》(*The Logic of Practice* 1990h)。此外，布尔迪厄对于文化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研究 [《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1984a)] 的贡献，对于语言社会学的贡献 [《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1991c)]，对文化社会学的贡献 [《文化生产

[1] 1993 年，布尔迪厄离开了子夜出版社，转而与门槛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合作。

[2] 《社会科学引用索引》在 1989 年排列的法国知识分子引用率(从高到低)的情况是：福柯，布尔迪厄，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阿尔都塞，萨特，普朗查斯，图雷纳，拉康，博德里亚，布东，以及阿隆。布尔迪厄在知识界的声望并不总是这样大，特别是在专业的社会学领域。一项关于在美国社会学会的核心出版物(包括《美国社会学》与《社会力量》)上发表的研究布尔迪厄的论文数目的调查表明，从 1971 年到 1985 年，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与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以及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受到了更多的关注(*Cumulative Index of Sociology Journals*)，1971—1985)。

[3] 事实上，《再生产》一书已经成为某种被引用的经典，特别是在教育社会学中。布尔迪厄更近的关于法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收集在《学术人》(1988b)与《国家精英》(1989c)中。

* 本书中凡括号内标有年份，未标外文姓名者的著作均为布尔迪厄所著。——译者

的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1993b)]，都在迅速得到承认。他的许多著作正在成为像文化社会学这样的新兴学科门类的标准参考书。他的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课题：从对阿尔及利亚农民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到对19世纪的艺术、作家的社会学分析，再到对于现代法国社会的语言、教育、消费者与文化趣味、宗教以及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是一个同时进行经验研究的重要的社会理论家。

同时，对于他的著作的了解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却是零碎的。缺少代表作的翻译，这个早先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他的某些强调法国教育的社会再生产的作用(Bourdieu 1973a, 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的著作在他较早的关于实践理论反思的著作(1972)之前被翻译成英语。这样，对于布尔迪厄的解读没有遵循他的理论发展线索，他被狭隘地当成了一个社会再生产理论家而不是因为他的一整套范围极为广泛的、赋予他的思考以活力的理论关切而被欣赏。然而到了1994年，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已经全部翻译成为英语。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布尔迪厄的早期的兴趣是围绕专业的学科部门展开的，这就把对布尔迪厄著作的知识限制在经过选择的专业兴趣上，比如人类学或教育社会学。他早期的国际声誉以及社会学界对于他的最早的批评都是建立在他关于法国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再生产》一书上，而不是他早期对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研究上。教育社会学家没有注意到他对人类学的关切——这种关切来自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研究经验，而正是这种研究经验推动着他对现代法国的社会学研究。这样，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他的某些最重要的对于社会理论的贡献相对没有被注意，而且某些针对布尔迪厄的批评好像建立在对他的研究社会生活的整个方法的片面理解上。^[1]但是，正如我在

[1] 参见华康德(Wacquant 1993a)关于美国对布尔迪厄著作的不平衡接受的清晰分析。在法国，对布尔迪厄的著作的接受也是不均衡的，参见 Accardo 1983, Caillé 1992, Collectif "Révoltes logiques" 1984, Ferry and Renault 1990。华康德与布尔迪厄合作的《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对布尔迪厄著作的综合介绍有助于矫正对布尔迪厄整个社会学规划的零碎接受。

第三与第四章将要解释的，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出现于一个广泛的跨学科背景之中，这一跨学科背景反映了法国 20 世纪 50、60 年代知识话语的特定组合，正是这种组合使得这个年代显得与众不同。

第三，对布尔迪厄著作的接受常常在(布尔迪厄的)信徒们的不加批评的喝彩与(布尔迪厄的)批评者们的不加思索的贬低之间走极端。^[1]即使在法国，布尔迪厄的著作也令人惊讶地很少受到富有同情心的批评性的评论。^[2]这无疑部分地源于布尔迪厄对社会科学中最正统的方法的尖锐批判。他的批判风格既为他招来众多的信徒，也树立了不少敌人。

现在是更全面综合地呈现、批判性地评价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模式的时候了。本书加入布尔迪厄与华康德(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哈克、马哈尔与威尔克斯(Harker, Mahar and Wilkes 1990)、詹金斯(Jenkins 1992)、罗宾斯(Robbins 1991)、汤普森(Thompson 1991)等人的行列，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本书将阐明并批判性地评价布尔迪厄的整个理论框架并把它定位在法国的知识语境中。虽然本书尝试全面把握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但是并不以事无巨细地介绍布尔迪厄的作品为目的。它提供的是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的几个核心主题与概念(其中的一些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布尔迪厄研究文献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富有同情但又是批判性的考察。虽然本书对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习性概念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是对于文化场域的关注却相对要少一些。然而，场域(field)概念是充分理解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关键，也是充分理解他阐述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方式的关键。他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对于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生产

[1] 一些例外应该在这里提及。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重新思考古典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观点》(1985)，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评论：论布尔迪厄》(1979)，都是对于布尔迪厄著作的主要方面的既富有同情心、又不乏批判性的研究；卡尔霍恩、利普马以及波斯通(Calhoun, Lipuma and Postone)等人的分析评论集《布尔迪厄：批判性的视角》(1993)代表了向这个方向迈出的重大步骤。

[2] 两个极端的例子分别是阿兰·阿卡尔多(Accardo 1983, Accardo and Corcuif 1986)对布尔迪厄著作的富有同情而没有批评的普及化；布东在他的《意识形态：习以为常的观念的起源》(Boudon 1986: 227—228)一书中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傲慢否定。

专家与符号权力的创造者的核心作用的分析，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都已经受到了注意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但是，正如我将在第九章与第十章要表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位于布尔迪厄社会学规划的核心。而且，他的关于科学知识分子与批判的社会学实践的规范性视点几乎没有受到关注。这些都是布尔迪厄著作的基本要素，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承认或批判性的评价。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填补英美两国的布尔迪厄研究文献中的这些空白。

布尔迪厄的理论世界的充分复杂性抵制任何简单化的概括。^[1]很少有别的著作像布尔迪厄的著作一样全面、复杂而富有创意。在依据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前提与哲学前提细察这种研究的操作机制方面，很少有人达到布尔迪厄那样的精细缜密。很少有人把实践的和策略的——实际上是政治的——定向运用于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工作使得对于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严格的“理论解读”具有潜在的误导性。^[2]布尔迪厄把自己的概念塑造为对于相互对立的观点的矫正。他的著作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宏大理论的持续的论争。^[3]他通过批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与他认为遍布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

[1] 米勒与布兰森(Miller and Branson 1987: 214)怀疑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的复杂性与广泛性能够在几页纸中简洁地概括清楚。卡尔霍恩、利普马以及波斯通(Calhoun, LiPuma and Postone 1993: 12)注意到，“布尔迪厄的著作抵制简单地把概念或主题进行先后秩序的排列。但是，华康德(Wacquant 1992)通过一个紧密的合作者(译按：应该是指布尔迪厄本人，1992年他们共同编写了《反思社会学导引》)在阐明贯穿布尔迪厄著作的系统整体性方面进行了极有启发性的努力。

[2] 布鲁贝克(Brubaker 1993: 217)认为，布尔迪厄的著作“特别严重地受到了概念论的、理论的逻辑中心主义的错误解读，这种解读把布尔迪厄的著作当作一套由精致的、毫不含糊的概念构成的、逻辑上内在联系的命题系统。”布尔迪厄的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特定的经验现象的指示器，或者系统理论的构成材料，而应该被理解为把一种总体方法传达给社会世界研究的启发性的程序。我将强调，布尔迪厄的文本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当然同时也是科学性的：它们都反映着特定的实质性领域中的知识问题，并策略地指向在这些领域生产一种符号效力。

[3] 事实上，布尔迪厄从这些理论对手的每一位那里都进行了借鉴，特别是结构主义。他认为每一种对立的理论都提供了重要的(即使是片面的)对社会世界的洞见。布尔迪厄的雄心则是克服这些理论各自的弱点、结合它们各自的力量，以便建构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科学。

义之中的实体主义的现实观，来反驳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

这样，布尔迪厄的首要关切不是对概念系谱学(conceptual genealogy)的关切，也不是忠实地追随任何特定的理论传统。布尔迪厄是一个理论家，但不是一个帕森斯传统中的系统理论家。他事实上尖锐地批判“理论化的理论”(theoretical theory)，因为它强调独立于经验研究对象的抽象概念化。布尔迪厄的概念首先不是为了对应于内在连贯、可以普遍化的形式规范而设计的，相反，它们是实用地从经验研究中以及与相互对立的知识观的论争中塑造出来的。他的概念在重点与范围上依据它们所处理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不断变化。然而，它们揭示出非常一贯的、指导他的所有研究的一套潜在的元社会学原则。

布尔迪厄是一个理论上的策略家，他的理论语言的选择明显地为了确立与相互对立的观点、特别是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之间的距离。他相信这种知识形式阻碍了总体性实践理论的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得以从中发展出来的知识背景与研究经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在第二章)。第三章介绍布尔迪厄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知识形式的批评，第十一章概述他的独特的总体性实践理论，包括反思性的社会学实践。第十章概述支撑他的社会学规划的政治方案。

最后，布尔迪厄已经发展出与行动、文化、权力、分层以及社会知识相关的独特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叉、相互缠绕，以至于把其中的一个从另外一个中抽象出来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是为了讲解与说明的目的。本书尝试阐明(布尔迪厄的)主要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提供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更加丰富的理解。第三章到第六章分析(布尔迪厄的)核心主张与概念，第七章到第九章转入对于实质性的研究领域(社会阶级结构、教育、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这种实质性的领域对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规划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文化、权力与再生产

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关于符号权力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要解决的是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主题。无论布尔迪厄是在研究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或者教会，一个中心的潜在前提是：分层的社会等级与统治系统如何在代际之间进行维持与再生产而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与有意识的识别。^[1]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研究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纳入竞争的与自我延续的统治等级体系而得到解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认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而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个体、群体以及机构（特别是教育系统）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对于布尔迪厄来说，权力实际上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领域，而是位于所有社会生活的核心。^[2]而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合法化。因此，他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文化的社会化如何把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性的等级体系中，相对自主的斗争场域如何使个体与群体陷于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的斗争，这些社会斗争如何通过符号的分类得到折射，行为者如何通过各种策略获取利益，以及他们如何在这样做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再生产着社会的分层秩序。这样，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3]

[1] 这是涂尔干对于“什么产生了社会团结”这一理论关切的一个变体，尽管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秩序是一个带有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等级化与不平等安排的分层秩序。（参见 DiMaggio 1979, Sulkunen 1982: 105）。

[2]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社会性的所有表达或符号再现都不能离开其建构性的权力关系，而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合法化。

[3] 对于布尔迪厄(1987b: 36)而言，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理论“很自然地导向一种政治理论”。

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力与特权的行使与再生产是布尔迪厄研究的一个核心的、统一的主题。他的雄心是要创造一门可以应用于所有社会类型的、个人与群体中间的、社会与文化的权力关系再生产的科学。在一个早期的表述(Bourdieu 1973a)中，他呼吁一种“关于结构之再生产的科学”，这种科学将是

对于法则的一种研究，在这些法则中，结构常常通过生产被投资于倾向系统——该倾向系统能够促生适应于这些结构的实践并因而有助于这些结构的再生产——的行动者来再生产自己。

在近期的一个表述(1987b: 92)中，布尔迪厄又把他的研究描述为提供一种群体的发生理论。这种理论将解释群体，特别是家庭，如何创造并维护整体性并因此使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永久化或得到改进。他敦促社会学家去探究“所有的社会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集体的存在与存在模式问题”(1985e: 741)。他集中关注文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群体如何寻求策略以生产并再生产其集体的生存条件、文化如何具有建构这个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对他来说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一个统率性的问题，也是一个贯穿其工作的重要主题(参见 Bourdieu 1985e: 741)。

处于布尔迪厄知识规划之核心的，是马克思以降西方社会思想的要害问题：文化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就是要尝试通过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的、但又不是还原论的对于文化生活的解释，找到一条超越经典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极对立的中间道路。^[1]

[1] 布尔迪厄解释说，他所以献身对文化的关注，是因为文化是一个被忽视的方面，而不是说文化拥有理解社会世界的理论优先性。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1987b: 61)回忆说，在50年代末研究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候，他发现了文化这个实质性的领域遭到了极大的忽视。在布尔迪厄看来，那个时候流行的文化概念，在把文化归结为上层建筑、从属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把文化唯心化的非马克思主义之间被分裂为两半。布尔迪厄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看作是努力超越这两种极端对立的文化观念。

他的思考开始于马克思但是更多地吸收了涂尔干与韦伯的思想。

在研究文化的时候，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实践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它包括：关于符号利益的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关于符号暴力与符号资本的理论。他的符号利益的理论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展到文化领域而把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与物质方面的关系加以重新理论化。符号利益就像物质利益一样客观存在着。他把文化阐释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他认为，权力的实施需要合法化，这样，他还提出了一种符号暴力与资本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符号形式作为既建构又维持权力结构的资源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些都不是整体划一的论述，而是相互交叉与渗透的、具有导向性的主题。它们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科学哲学以及经典社会学传统的影响。我们将在第三与第四章对此进行讨论。

能动性 / 结构问题

布尔迪厄的另一个持久的关注领域是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推动人的行为？个体行为是对外在原因的回应么（比如主流的社会学传统就是这样认为的）？个体行为是由“文化”、“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的么？或者，行动者是因为自己认同的原因作出行动的么（比如现象学、阐释学以及社会科学主流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的）？相应地，行动者的概念在解释行动者的行动时处于什么样的认识论地位？是否应该认为它们不具备认识论的可靠性（就像在涂尔干传统中的情况那样）？或者它们应该成为科学解释的基本建筑材料？吉登斯(Giddens 1979)认为这些问题——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

布尔迪厄是二战以后最先把能动性/结构问题当作社会学基本问题

的这一代社会学家之一。他提出应该通过一种“辩证的关系”来把能动性^①与结构联系起来。他反对把人的行为理论化为直接的、不经中介的对于外在因素——不管它们是微观的互动结构，还是宏观层次的文化、社会或经济因素——的反映。同时，他也不认为行为是内在因素（比如主观意图、精心计算）的简单结果——像唯意志论与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的那样。在布尔迪厄看来，相互排斥对方的、要么强调宏观方面、要么强调微观方面的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在维持古典的主观/客观的二元论。他想要通过深入阐述行动来超越这种二元论，以便把行动的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唯意志论方面与决定论方面综合进一个单一的理论中，而不是割裂为相互排斥的解释形式。这样，布尔迪厄构想了一种关于实践的结构理论，这种理论把行为与文化、结构、权力联系起来。这个理论从根本上为他的基本概念——习性——奠定了基础。“习性”这个概念与“文化资本”一起成为他的理论标志。我们将在第五章考察他的这一理论关切以及他的习性概念。

权力场域

实践发生于被称为“场域”的结构化的斗争领域。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这个核心概念把习性行为（action of habitus）与现代社会中权力的分层结构联系起来。布尔迪厄把现代社会阐释为一系列相对自主但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由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源组成的生产场域、流通场域与消费场域。场域调节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场域的概念晚于他的更为人所熟知的文化资本概念与习性概念，这个概念相对地不怎么著名，但是它已经成为布尔迪厄的理论大厦的支柱。我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个概念的主要方面。

我在第六章的结尾中概括说明了布尔迪厄总体性实践理论的完整理论模式。在第七章、第八章与第九章，我将阐述布尔迪厄如何通过场

域分析的视野把他的习性概念与文化资本、符号/象征资本概念结合起来，以便分析现代法国的社会阶级、教育系统以及知识分子。^[1]

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由于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误识”（mis-recognize）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机构如何把个体与群体锁定在统治的再生产模式中，所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开权力关系的这个隐蔽的方面。布尔迪厄把社会学的实践看作是一种社会分析，在这里，社会学家要揭开“社会的无意识”，就像心理分析学家要揭开病人的无意识一样。^[2]社会无意识是由行动者在参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时加以追逐的那些不被承认的利益构成的。在布尔迪厄看来，由于正是对这些具体化的利益的误识构成了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所以他相信公开暴露这些利益将会摧毁其合法性，并开启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通过暴露这些把个体与群体捆绑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的隐在利益，社会学就成为让人从统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工具。在这里，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与批判理论相互交织在一起。

布尔迪厄相信，社会分析工作的好坏的一个指标，就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抵制。就社会学的分析触及到行动者的不被承认的重大利益而言，它将常常引起抵制。布尔迪厄（1987b：7—10）明确地承认自

[1] 我没有讨论的布尔迪厄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领域是他对于语言的分析。语言是作为实践（包括语言实践）的促生者的习性的一个关键性载体；语言也发挥着一种文化资本形式与符号资本形式的作用，并受到他的场域分析视角的影响。参见布尔迪厄（1991c）关于语言的社会用途的几篇主要论文以及汤普森（John B. Thompson）写的富有洞察力的导言。同时参见几篇把布尔迪厄的语言分析与教育（Collins 1993）以及语文学（Hanks 1993）联系起来的信息量很大的论文。

[2] 布尔迪厄的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分析”的社会学概念可能最明显地体现于他的《区隔》（1984a：11）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当社会学面对像趣味——统治阶级场域与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斗争最重要的赌注之一——这样的对象的时候，最接近于社会心理分析。”